

凋萎的花：论《郁金香》的女性边缘意识

□ 马懂瑞

【摘要】小说《郁金香》中主人公独特的女性身份及旧社会女性苦难的人生遭遇，无不体现出张爱玲独有的女性边缘意识。张爱玲的边缘意识既感性又理性，她一方面在感同身受中与小说人物共鸣，另一方面以旁观者的视角审视，清醒又独立。而这样特有的边缘意识正是源于张爱玲个人的生命体验，即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感情悲剧带来的断层以及战乱时代带来的苦难等。

【关键词】《郁金香》 张爱玲 女性边缘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881 (2025) 08-0008-04

《郁金香》是2005年“出土”的一篇张爱玲佚作，初连载于1947年5月16日至5月31日的上海《小日报》，重刊于2005年10月的《上海文学》。“郁金香”寓意着美好与高雅，但在张爱玲的这篇小说中，只能看到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和女性处境，和鲜花的含义反差极大。小说中的女性仿佛都是凋萎的花，在社会和家庭的挤压下逐渐丧失生命的活力。从金香到老姨太，再到阮太太，每一位女性都有自己的悲惨遭遇，张爱玲以其独特的边缘意识审视着现实与作品中的每一个人。

一、《郁金香》中的旧社会女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半生缘》中的顾曼桢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当《郁金香》被重新发现的时候，熟悉的张氏风格扑面而来。女性依然是这部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并且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物质或精神上处于边缘地位。《郁金香》是张爱玲在上海期间最后的留存，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和人性更深的感触。

1. 生存状态的边缘化：金香

《郁金香》的故事围绕阮公馆的女仆金香展开，“金香很吃力地把两扇沉重的老式拉门双手推到墙里面去”^[1]，这一开篇仿佛暗示了金香与自己沉重的命运相抗争，暗示了每一个旧社会的

女性都身负沉重的枷锁。

金香是阮公馆的女仆，打扫卫生是其分内之事，可宝余总是来捣乱，用熏鱼头、肉骨头去喂狗，弄得房屋到处是油渍，乱糟糟的。不仅如此，宝余还总是骚扰金香，说家里的狗和金香长得一样，就差没有涂胭脂粉。言语上的侮辱都是轻的，他还经常对金香动手动脚，假装给她打蛇蚤，然后趁机摸金香的背，占她的便宜。这是公馆里地位身份的差距，更印证了金香生存状态的边缘化。相较之下，宝初对待金香的态度就显得弥足珍贵。他会在宝余欺负金香的时候出言阻止，即使这对改变金香的处境无济于事。但宝初内心的善意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无法在旁人面前展现出来。这一天宝余去阎家赴宴，阮太太夫妇与老姨太围着无线电听节目，宝初和金香才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金香在给即将赴徐州工作的宝初钉被子，当宝初推门进去的时候，“金香赤着脚踏在上面，那境界简直不知道是天上人间”^[1]。宝初和别的人不同，他愿意和金香一起跪在被子上，断断续续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意，谁知得到了金香斩钉截铁的拒绝。金香哭了，她对宝初是有感情的，宝初是这个公馆里为数不多对自己好的人。可金香明白，他们终归身份有别，少爷和女仆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张爱玲以女仆的视角切入阮公馆，让我们看到了权贵阶层不为人知的一面，更感受到

作者简介：马懂瑞，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旧社会对女性的迫害。

2. 依附于家庭的边缘：老姨太

“这老姨太生得十分富态，只因个子矮了些，总把头仰得高高的。……她出身是北京的小家碧玉，义和团杀二毛子的时候她也曾经受过惊吓，家里被抢光了，把她卖到陈府，先做丫头，后来收了房。”^[1]短短几句就概括了老姨太的前半生，苦难而被动，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受时代、社会和家庭的影响，老姨太自己并未主动做过什么事情，她的人生就从女儿变成了丫头直到后来成为填房。老姨太和女儿阮太太的命运何其相似，旧社会的女性好像别无出路，只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黑世界被动前行。

不仅如此，老姨太作为儿女家里的长辈还要忍气吞声，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老姨太怕女儿，怕儿子，也怕荣妈。”^[1]住在姑爷家里，她不免有些低人一等。老姨太年轻时靠着丈夫漂洋过海，见识过一些世面，便成为自己在仆人面前吹嘘的资本——去过保加利亚、坐过德国船、被德国人服务过、见识过德国的开放风气等。但这一切风光都是丈夫带给她的，如果她不是陈府填房，这些荣光可能永远与她无关，老姨太同很多旧社会女性一样，需要依附家庭而生存，无论是父母的家庭还是儿女的家庭，她始终是依附于家庭的边缘人。

3. 沦落在婚姻的边缘：阮太太

“阮太太一醒就撒铃叫人。老姨太照例来到女儿床前觐见，阮太太照例沉着脸冷冷地叫一声‘妈’。”^[1]“觐见”表示地位低的人去见上位者，张爱玲在此处使用“觐见”来描述母亲见女儿的场景，说明阮太太对母亲并不尊重，甚至有点看不起，呼唤母亲的表情和语气更是佐证了这一点。

“阮太太面色苍白，长长的脸，上面剖开两只炯炯的大眼睛。她是一个无戏可演的繁漪，仿佛《雷雨》里的雨始终没有下来。”^[1]张爱玲将她比作繁漪，代表着她与繁漪有着同样的命运，在婚姻中并不幸福。或者说她也要依赖男性而生存，她是阮公馆的填房，还带着一大家子住在公馆里，丈夫整日忙于工作交际，也不经常回来，她唯一

的乐趣便是操心弟弟的婚姻，以及管理仆人。

阮太太在公馆里的地位毋庸置疑是尊贵的，但她自尊心强，内心敏感又脆弱。被女仆金香吵醒，她毫不客气地对其辱骂，得知还有自己的兄弟掺和其中的时候更加恼怒。因为她的兄弟和她一样身份卑微，要是说闲话仿佛连自己也捎上了。“她有苦说不出，只顾喝道：‘你这个死丫头！自己那样疯，还要说二舅老爷！你就少给我惹惹他们罢！下回你再敢招惹舅老爷们，我马上把你赶出去！’”^[1]由此可以看出，阮太太虽然恼怒金香打扰了自己的美梦，但其实更生气的是自己的兄弟和仆人打闹。最关键的是这个仆人的身份——丈夫前妻的丫头。这就触碰到了阮太太的敏感自尊，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如之前的女主人，自己的兄弟更是和女仆有染，这是她决不允许的。正是因为她沦落在婚姻的边缘，面对丈夫，她内心卑微，所以在仆人面前要假装盛气凌人，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真实处境。

二、感性又理性的边缘意识

《郁金香》体现出的女性边缘意识具有独特风格，张爱玲一时仿佛是人物的朋友，为她们感到不公和心酸，一时又好像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冷静地看着一切发生。感性又理性的边缘意识似乎充满矛盾，实际上是对现实与创作最全面的观照，为张爱玲的作品带来独特的魅力，也让读者洞察到那个年代边缘女性的生存境遇。

1. 感性：在感同身受中共鸣

女性处于边缘地位，她们的很多选择都是无奈之举。因此，张爱玲对女性的生存境遇深切关注，“透过家庭婚姻这个窗口，她一笔一笔地临摹‘生命的图案’，捕捉那混沌莫名中‘令人心酸眼亮的一刻’”^[2]。张爱玲的边缘意识是感性的，因此她塑造出来的人物都处于千丝万缕的情感中，从亲情到爱情，再到友情。张爱玲用情感这张大网织起了所有人，《郁金香》的故事正是建立在情感之上，阮公馆的人能生活在一起或多或少是因为亲情，而少爷和女仆有了牵连则是因为爱情。张爱玲会用心去感受现实世界的边缘人

物，也会用心体会她们的情感，所以《郁金香》篇幅虽小，读起来却沁人心脾，令人印象深刻。

“每一个旧社会女性那浸着血泪的人生，伴随着被侮辱、被支配、无力抗争的无奈，始终在边缘地带徜徉。”^[3] 张爱玲身处变革时代，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均大声疾呼要把妇女从旧传统、旧礼教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方面，要打破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长期的社会习俗和禁锢使得女性不可能一下子就从森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中喘过气来。张爱玲用细腻感性的描写让读者在感同身受中共鸣。

2. 理性：在旁观中审视世界

张爱玲虽然感性，却将这个世界看得很清楚，深刻洞察旧社会女性的生存困境，上到公馆女主人，下到女仆，她仿佛清楚地知道她们每个人的边缘处境，作为一个旁观者清醒地审视她们。“然而这一点点女性的手触在这阴暗的大客厅里简直看不到什么。”^[4] 这是小说开篇张爱玲就深刻认识到的，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小说里，女人一直都是社会家庭中围绕男性的边缘角色。面对宝初的告白，“金香摇摇头，极力地收了泪，脸色在两块胭脂底下青得像个青苹果。她又摇了摇头，道：‘不是我不肯答应你，我知道不成呀！’”^[5] 金香身为女仆，面对少爷的心意，她知道两人的感情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金香的抉择，更是张爱玲清醒的认识。老姨太在旧社会无法立足，从前靠老太爷，现在靠姑老爷，经济无法独立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无法自立，更何况一大家子寄人篱下。张爱玲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得很清楚，所以她笔下的女性角色总是透着独有的卑微。阮太太同样如此，在这段婚姻中，男女的地位本就不平等，在小说中她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冠上夫姓，成为阮太太。中国旧社会的女性没有自己的人生，嫁人后理所当然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张爱玲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郁金香》中的女性边缘意识不仅是张爱玲保持独立主体意识和自由灵魂的体现，更是她站在社会和时代的边缘审视、认知世界的方式。正

是因为这种边缘意识，她才成为这个世界的旁观者，独立于尘世之外，洞见世人的内在和命运，才能以反思的视野审视这个畸形的世界。

三、个人生命体验生成边缘意识

每个作家笔下的故事必然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张爱玲的这种边缘意识离不开她个人的生命体验。《郁金香》的连载始于1947年5月，此时的张爱玲留居上海，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以及个人感情方面的断层让作家本人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时局动荡的上海仿佛一座孤岛，边缘人群的生存岌岌可危，张爱玲在这个特殊的时空里关注到边缘女性的生存和生长，离不开她复杂的生命体验。

1. 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6] 从张爱玲的自传性散文《私语》中，我们可以窥见她的家庭环境。张爱玲虽出生名门望族，但张家到她这一辈时已是花落黄昏，辉煌不再。中西方文明的对立与冲突造成父亲与母亲巨大的价值观差异，家庭分崩离析，而张爱玲则一直徘徊在两个家庭的边缘。父亲只知道抽鸦片虚度光阴，而母亲向往西方的自由文明，无法忍受这种腐朽的生活，最终父母离婚。一方面是母亲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另一方面是父亲和继母所代表的旧式家庭，张爱玲无法彻底融入任何一方，形成一种与世隔绝的边缘意识，成就了她的冷峻超然的创作风格。“张爱玲产生于一个历史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孤岛，其实也是一种家庭伦理感情意义上的孤岛。”^[7] 原生家庭给张爱玲带来的创伤深刻影响了她的创作，独特的生命体验让她洞察女性的边缘地位，促成其用边缘意识观察一切，解构一切。

2. 感情悲剧带来的断层

1947年6月，张爱玲给已经脱离险境的胡兰成写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也是不看了的。”^[8] 三番五次被伤害的张爱玲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奸胡兰成，也许他们刚开始的相遇

就是错误，但这段感情也让张爱玲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虽然这段感情结束了，但给张爱玲的生存和心理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一时之间，张爱玲这三个字仿佛在上海消失。“民国世界临水照花人，一下子成了战后的汉奸弃妇，这对于一个水仙花型的作家，心情肯定好不了。”^[5]对于张爱玲此段的状况，柯灵的描述是：“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7]虽然人们平日里很难感觉到感情的存在，但其实每个人都置身其中，不论是当时在上海的胡兰成和张爱玲，还是小说中的宝初和金香，都面临情感的纠缠与考验。小说人物最终的结局缘于张爱玲惨淡的情感体验和对感情的深刻认知。和胡兰成的爱情悲剧给张爱玲带来巨大的冲击，这种断层或者说幸福之后的空虚感令她的创作更加敏锐与写实。

3. 战乱时代带来的苦难

张爱玲生活于特殊的时代氛围，感觉到不可知的命运对人的“惘惘的威胁”，这种不可言传的悲哀、对命运的没有把握，有很多是从当时特定时段的生活里来的^[1]。张爱玲本来打算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因为战乱去了香港，之后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学停办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已是抗战时期的孤岛，不同的文学意识与主张各自为战，既有左翼作家的工农进步思想，也有为伪政府服务的汉奸文化。张爱玲从不参与进来，她并不认可这些，她只是用自己的笔墨静静地写着上海的爱恨情愁，刻画着上海家庭的人生百态，就像一朵孤芳自赏的莲花，处于文坛的边缘，是一个真正的另类。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边缘人物只是一群在人世间跋涉的普通人，她们没有豪门家族的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生活没有一丝波澜。张爱玲对她们的细致描写，让我们了解到人性深处的阴暗与复杂。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身不由己，面对战乱时代所给予的一切，无论幸或更多的不幸，都只能被迫接受。《郁金香》的重见天日，让读者穿越历史时空回到张爱玲经历过感情悲剧的时代。值得推敲的细节，藕断丝连的情感，余音绕梁的结局都散发着经久文学

魅力。从金香到老姨太、阮太太，无论她们的人生怎么发展，读者都能从中联想到作者张爱玲的现实生活，当《郁金香》以一句“仿佛这夜是更黑，也更深了”^[1]结束后，读者回想的却是无数女性如“凋萎的花”似的沉没在时代的边缘，苍郁又悲凉。

四、结语

《郁金香》的爱恨情愁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从太太到女仆，每个女性无不承受着社会内外的边缘性对待。尽管那时女性主义思潮已传入中国，但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女性无法适应自身角色的改变，依然不知何去何从。张爱玲在此时看到了问题所在，用自己独特的边缘意识发掘社会中的隐疾，将其于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张爱玲的世界沉浮在黄昏与黎明的交汇处，充满了色彩的幽暗与丰饶，如同在黎明的第一线晨光中挣不脱的昨夜的梦魇。”^[5]这种感性又理性的边缘意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女性生存境遇的视角，更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 [1] 张爱玲. 郁金香 [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 [2] 刘思谦. “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 [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
- [3] 刘秀云. 生命的缺失与叛离——边缘意识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 [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7.
- [4] 张爱玲. 流言 [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 [5] 许子东. 许子东细读张爱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6] 余斌. 张爱玲传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 [7] 柯灵. 遥寄张爱玲 [J]. 读书, 1985 (4).

(特约编辑: 张帆)